



刘 腾 赵连稳

我国的天津和武汉各有一所问津书院，天津的问津书院创办于清乾隆年间，武汉的问津书院位于古黄州府黄冈县孔子河村（今属武汉新洲区），其历史可追溯到宋末元初，自创立起，一代又一代名儒在此孜孜讲学，传道授业，可谓荆楚书香千古长。明朝中后期，问津书院讲学更是“风动海内，一时钟鼓管弦之盛”，几乎和当时的东林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还有京师的首善书院相媲美。在清代，问津书院走出了很多举人和进士，“翘材辈出，雄长鄂中”。

（一）

天津问津书院名字取自“汎海问津”，是说“孔子之道犹海也”，学子只有刻苦努力，才能“得其津”；武汉问津书院所在地，据说是孔子“使子路问津”处，名称即由此而来。西汉到南宋，地方官在孔子河村修建孔庙，“立庙设学”。宋末元初，湖广儒学提举龙仁夫在这里首创书院，时人称之为“龙仁夫书院”。明中叶以降，在地方官的支持下，书院山长耿定向择地新建孔庙和书院，以满足生徒日增的需要，并遣专人前往山东曲阜摹塑孔夫子像，供奉于孔庙大成殿内。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新的孔庙与书院建成，并合而为一，湖广巡抚熊尚文莅临书院，取子路问津意，为书院题额曰“问津书院”。

书院中轴线上建有知津堂用以讲学，藏书阁用以聚书，至此，书院具备了承载讲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问津书院还在河南的商城创办了“问津书院分院”，这是我国书院史上的惟一。明末战乱，问津书院房舍倾圮，清初重修，“焕然一新”。清代咸丰年间，书院再遭破坏。同治年间，在地方士绅的支持下，书院又渐复元气，至清末改制为学堂。明代是问津书院的辉煌时期，大批名儒前来讲学，盛况空前，书院讲学，于斯为盛。

（二）

武汉问津书院“创于宋而盛于明，大端以学为事”，也就是说，问津书院讲学活动持续了四五百年。问津书院之所以能够在历史长河中“传弦不绝”，主要得益于它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和世代荆楚名士的薪火相传。不同学派的宿望魁星在书院讲学，到明朝中叶以后达到鼎盛。还在南宋时期，就有“闽学派”的朱熹、“湖湘学派”的张栻，以及“婺学派”的吕祖谦先后到这里讲授程朱理学。元初，龙仁夫和董敬中、吴应澍（今属新洲区人）共同创办书院后，邀请同乡好友、大儒吴澄前来，四人在书院讲授的仍然是“濂洛关闽之学”，即程朱理学。

根据有关资料统计，明代中后期，前后来问津书院讲学的名儒达74人，本地有郭庆、吴良吉、萧继忠、官应震等多人，还有黄安的耿定向、耿定理、耿定力三兄弟，黄陂的黄云闾、黄彦士、黄奇士，以及麻城的彭好古等人，其中传播王阳明学说的占大多数，也有个别的是反对王阳明心学的。另外到书院讲学的还有“四方会讲者”与“移书讲论者”。“四方会讲者”则有金陵的焦熹、耒阳的曾凤仪、零陵的唐虞等，这些学者不是常年书院讲学，而是前来进行学术交流的；“移书讲论者”则有吉水的邹元

标、罗大紘、三原的冯从吾等人，他们是将自己的学术见解以书信的方式与书院师生进行交流。万历、天启年间，书院闻名遐迩，前来讲学和听讲的士人“云集景附，项背相望者数十年，书院讲学，至此号为极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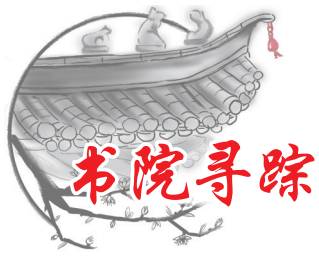
（三）

明代主讲武汉问津书院的名儒有的是王阳明嫡传弟子，有的是其弟子的学生。王阳明嫡传弟子中主讲问津书院的有正德年间的吴良吉、郭庆，两人都是黄州本地人、王阳明的得意弟子。吴良吉、郭庆之后，耿定向、耿定理、耿定力三兄弟主讲问津书院，他们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三人思想不尽相同，却同在问津书院自由地讲学。耿定向多年任京官和地方官，晚年辞官回归故里黄州，开始了问津书院的讲学生涯。他注重“人伦之至”，告诫弟子以阳明先生“良知”为旨归，传授的是王阳明的思想，成为阳明后学时期书院讲学的重要人物。耿氏三兄弟中，耿定向和三弟耿定力思想基本相同，为阳明学说的正宗，耿定理则是王学的“异端”，和李贽的思想接近。在耿氏三兄弟之后，主讲问津书院的是耿定向的学生萧继忠。萧继忠曾经在京师的首善书院、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担任主讲数年，之后返回黄州主讲问津书院。他注重书

院讲学的规范化与制度化，每月十六日聚会研讨，年末进行一次总结。他讲学的主要内容是“修德问业”，在问津书院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问津书院是明代中后期传播王阳明心学的中心，王学的重要特点是对理学进行平民化诠释，讲求道德修养，注重培养气节，不以科举功名为第一要义。萧继忠担任书院山长期间，倡导“百姓日用之学”。一日，萧继忠避雨一屠户家，屠户问萧继忠：“近来所讲何学？”萧答：“不过平常日用事。”又问：“所讲学问对我这等人也有用吗？”又答：“当然了，知道卖肉不缺斤短两即是圣贤事，每做事问心无愧，便是圣贤学问。”屠户听罢，为之动容。明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对问津书院不为其立生祠。怀恨在心，以东林党人邹元标、顾宪成、高攀龙等曾经参与书院讲学为借口，对萧继忠、刘承烈两位书院名师进行迫害。天启七年（1627年）锦衣卫来抓捕他们时，两人镇定自如，在押往京城途中，阉党被崇祯帝捕杀，两人也获释返乡。

在我国古代几大书院中，像武汉问津书院这样讲学能够持续四五百年、且颇具规模和影响的书院还是不多见的，只有岳麓、白鹿洞两大书院可与之相比。明朝中后期的书院不太重视科举考试，从问津书院走出来的举人、进士多集中于清朝，由于黄州是问津书院所在地，故有“惟楚有材，独黄为冠”的说法。但由于问津书院距离武汉市中心较远，湖广总督张之洞没有将其作为传播洋务思想的主要场所，而是新创两湖书院培养洋务人才。因此，天津的问津书院地处晚清北方洋务运动中心，其名声和影响相对超过武汉的问津书院。



书院寻踪

构建开放共生的智慧学习平台

王 珏



在“互联网+”时代，学习资源实时共享、知识创新协同建设、教育服务在线迭代、认知反馈实时给予的智慧学习新模式，正进一步推动社会整体教育向着公平、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提供广阔阵地。智慧终端、泛在网络、虚拟技术的演进，也日渐拓展着学习场域的边界，使学习行为与学习空间从学校走向社区、走向社会，形成抽象认知与情境感知相融合的智慧教育新生态。

面向未来、面向全民、面向创新的新生态

智慧学习平台是综合社会知识资源、前沿科学技术和全新时代观念的有机空间，是在模式化创新推动下实现效益性提升的系统升级。

智慧学习平台是面向未来的动能型平台。一方面，智慧学习平台是去中心化、去线性化的，打破了知识垄断壁垒，使优质教育资源得到极大程度的充实和丰富，并以碎片化和链接化的学习方式逐步取代集中式的学习方式，从而在大幅降低知识获取成本

的同时提高了知识获取效率。另一方面，智慧学习平台又是集资源化、集群智能化的，能够发挥教育生产者与实践者的集体智慧，构建共生型的数字资源新生态，有效解决以往知识创新者与基层学习者之间的信息鸿沟，为社会知识经济的发展提供众筹、众享、众建之力。

智慧学习平台是面向全民的服务性平台。开放与在线教育对学习者的身份、地域、能力等要求更为宽泛，为教育公平的逐步推进发挥了积极作用。传统教学环境是教育者与学习者同处一个时空并线性地交换思想，智慧教育平台则是将教育时空扩展为任何时空，且知识的传播由单向转为多向，放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作用和价值，也让跨区域、跨行业、跨时间合作研究成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低水平的信息复制，加速了知识创新的速率。

智慧学习平台是面向创新的重构型平台。智慧学习平台的形成过程可促进三个层面的创新重构：一是学习模式的重构，探究式、自主式、互助式学习观念和泛在学习、开放学习、移动学习形式革新了传统学习模式，并以智能时代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形成新的教育方法论。二是前沿科技的重构，5G等网络技术及智能终端、交互模式的创新应用，将使智慧学习大环境的形成过程成为科学技术新形态的发展过程。三是教育生态的重构，智慧学习平台对信息素养、数字化思维、互联网思维以及多平台要素交互能力等要求的强化，将推动人工智

能技术更快向公众普惠，从而进一步消弭数字鸿沟。

共享、跨界、协同的知识发展综合体

智慧教育平台在集社会教育资源、举社会共建之力的整体导向下，使分散的知识信息有机聚合，全员、全面、全程性地提高社会教育发展和知识经济建设。

集成与共享：促进教育资源的动态平衡。智慧学习平台的形成既需要充分发挥学校、企业、社区、社群、科研机构和个人等多主体知识优势，建立多方参与的协同互利机制，也需要依托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将跨区域和跨类别的信息汇聚为庞大资源库，建立系统高效的运作模式。同时，智慧学习资源管理服务也会随着参与者的增多日趋完善，提升共建共享的质量和效益。这些发展过程都将深度打通社会各方面、各层面的教育资源，促进知识生产方、传播方与使用方之间多维度的互动，从而在动态过程中推动社会信息资源的流动与平衡。

跨界与新生：服务跨学科交叉式创新。互联网智能技术促使新兴学科、领域、形态叠出，并多发在产业边界交叉地带。这必然要求教育做出改变，加快布局未来战略领域，在对现有专业教育内容深度挖掘的同时，进一步打开应用视野，与各类前沿学科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紧密结合。智

慧学习平台开放性与参与性的特征，便于多知识领域的建设者突破现有学科和专业限制，分享前沿动态、交流创新方法，为更大范围内实现理、工、农、医、文、艺等学科间的交叉创新提供契机，推动由协同创新引领的质量革命，实现教育全领域的内涵式发展。

合作与应用：知识经济的协同化发展。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离不开社会发展方式和知识创新方式的转型。只有激发社会全员的学习动力，才能最大化发挥群体智慧、提升协同创新能力。智慧学习模式能有效促进社会个体在合作学习的基础上实现合作创新，即学习者达成共同的认知目标而形成学习社群，并产生积极的互动关系，共同构建新知识体系并探索新实践路径。这种学习生态模拟了产品研发前期的创新设计，在全球产业化生产的整体语境下，有利于对创意思维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也利于知识创新向产业应用的快速转化。

教育资源的普及与创新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社会发展水平，也关系着科学研究、社会发展、创新文化建设等方面面。建设理念先进、结构科学、机制完善的智慧学习平台是时代所需，在引领我国信息化教育资源建设迈上新台阶的同时，也促进社会个体和专业群体在公平、开放、流动的知识环境下共同发展与协同创新，从而为学科前沿突破、教育模式变革、资源深度聚合、知识转化应用提供新空间。

唐代《千金要方》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各科，理、法、方、药齐备，对后世中医学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孙氏七岁就学，日诵千言，时有“圣童”之称。长而博学多闻，善谈老庄，兼好释典，通晓百家之说，尤精医药之学。为人超凡脱俗，先后婉拒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三朝征召，终身不仕，隐于山林，亲自采制药物为人治病，后世尊其为“医圣”“药王”。

《千金要方》共计53万字，分233门，合方论达5300余条，包括医论、医方以及用药、针灸等经验，兼及服药、食疗、导引、按摩等养生方法。内容主要是：序例（大医习业、大医精诚、治病略例、诊候、处方、用药、合和、服饵、药藏）、妇人诸病方、少小婴孺诸病方、七窍诸病方、风毒脚气病方、诸风病方、伤寒诸病方、五脏六腑诸病方、内科诸病方、外科诸病方、食疗、养生、脉诀、针灸等。

《千金要方》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中药学、方剂学以及中医诊断学、伤寒、温病、内科杂病、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等领域均有建树。其中最值得推崇的是，该书以“务在简易”为编撰宗旨，打破传统方法，以脏腑辨证统方，将杂病之方以“五脏六腑”为纲进行分类，即在某某某腑之下，先分虚实，次别寒热，继列与本脏腑相关的病证。这种以脏腑寒热虚实为中心的杂病分类辨治法，是对《黄帝内经》脏腑学说的发展，已接近现代临床医学的分类方法，不仅查阅方便，而且有助于对疾病的系统认识。此外，该书将《妇人方》《少小婴孺方》置于全书之首，其用意及编次均具创新之意，开创男女平等风气之先河。

《千金要方》在深化疾病个性研究方面成就突出，在论证上明确按内、外、妇、儿、针灸、急救等学科分科列病，每一学科均涉及许多独立的疾病和病名，分析了病源、症候及其诊断指征和治疗方法。例如在寄生虫病方面，提出了蛔虫、蛲虫、寸白虫（绦虫）、射工（血吸虫）等，病源十分具体，针对病因展开治疗。这种针对疾病个性分门别类的研究，将每种疾病从其病理学角度进行深入的考察，突破了前人“六淫为病”的笼统说法，为区分疾病、探求病因，寻找特异性治疗方法开辟了道路。

《千金要方》对唐以前及唐初药学成就、民间药物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对中药材的栽培、采取、贮存、保管、炮制加工及汤、酒、丸、膏等十余种剂型的制作方法，都有详尽的阐述。值得一提的是，孙思邈强调医生必须识药，亲自参与药物的采集和炮制，反映出对病人高度负责的态度，其用药思想对当今临床治疗具有颇多可资借鉴之处。《千金要方》中还大量记载了孙氏本人长期临证用药的经历和体会，反映出不拘泥于古方大胆创新的理念。其中，他结合炼丹术的技艺与剂型、以砒霜治疗疟疾的临床实践，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化学成果和治疟方法，早于国外1000多年。

《千金要方》所收方剂约4500余首，除来自于前人或当代医家著作外，还包括孙思邈本人的临床用药、民间的单方验方，各少数民族以及国外的医方，涉及伤寒、内科杂病、妇科、儿科、五官、外科、皮肤病、美容乌发、养生食疗等，内容极为广泛。其中的食疗、养生、补益等方面的论述与方治，体现出孙思邈在养生对抗衰老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学说，具有开创之功。在食疗学方面，孙氏对食物的分类与论述、“食疗不愈，然后命药”的治疗原则、饮食宜忌学说为后世中医食疗养生学奠定了基础。在养生学方面，《千金要方》上承《黄帝内经》及秦汉魏晋六朝的养生思想，下启唐后养生理论，在医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方法简便易行，其方治切合中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点，至今仍具有指导作用。在其晚年编著的《千金翼方》中，孙氏明确提出“养老大例”“养老食疗”，创造了我国初具规模的老年医学体系，较英国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罗杰·培根于公元13世纪写的《老年人的治疗与青年人的保护》一书早600余年。



曾 凤

《千金要方》是针灸医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有许多新的发明和创造。主要体现在：一是创绘彩色《明堂三人图》，将经络腧穴集中于三人形之上，使之准确直观，一目了然。二是进一步阐释了经穴理论，补充发展了经络腧穴学说。三是发明了手指比量取穴法，至今仍然广泛运用。四是首次提出“阿是穴”，以患者痛处为穴，直接进行按摩针灸，较腧穴更有显著效果，扩大了针灸穴位范围。此外，该书在扩充经外奇穴、选编针灸验方以及提倡保健灸、注重热症灸等方面多有创建，为针灸临床治疗与保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千金要方》在医学教育方面，树立了以“精”“诚”为核心的准则。所谓“精”就是医技深湛，“精”在对天地人、人的生命、人的肉体组织和各种精神活动的整体辨证认识、准确把握和积极维护。所谓“诚”就是医德高尚，诚在“先发大慈侧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诚在“安神定志，无欲无求”；诚在“对患者皆如至亲，普同一等”“用生命以济危急，一心赴救”。“大医精诚”的医德学说，将儒家“医为仁术”的精神具体化，是孙思邈学说的主题和核心，其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医德学说，对中医医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所奠定的医学道德体系，被西方学者称为世界医德法典的渊源。

《千金要方》首次系统阐述和运用了中医的功能。春秋战国时期《国语》提出中医药学同时具有治国、治人、治病三项功能，此一思想在《千金要方·诊候》篇中得到系统阐述，其文云“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上医听声，中医察色，下医诊脉”。孙思邈进一步引申到临床诊断和治“未病”“欲病”“已病”三个方面，提出“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凸显了中医的特点与思维方式。



中华古籍医籍